



粟裕论苏中抗战

新四军丛书

06

《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

粟裕论苏中抗战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粟裕论苏中抗战
编 著 者 《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
责任编辑 杨 杰 刘 卫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1)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插页7
印 数 1—3000册
字 数 383千字
版 次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960—9/K·104
定 价 7.2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抗战时期的栗裕同志

编辑说明

苏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的八个战略区之一。1940年10月，陈毅、粟裕领导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决战黄桥，歼灭了韩德勤部主力，打开苏北抗战局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全军整编为七个师，粟裕受命任第一师师长(后兼政委)，率部于苏中地区开展与坚持抗日斗争。4月，苏中军区成立，粟裕兼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粟裕又先后任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和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直到1944年底奉命南下苏浙皖边区，执行发展东南任务。

苏中指的是江苏省中部地区，东临黄海，西界运河，南达长江，北至斗龙港沿东台、兴化旧县境北端之线。苏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苏中抗日根据地扼长江下游北岸，与南京、上海日伪统治中心隔江对峙，敌我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日寇为全面占领苏中，深化殖民统治，以巩固其侵略后方和掠夺苏中的人力物力资源，除多次调集重兵发动全面大规模“扫荡”外，更在苏中配置一个约五千六百人的独立混成旅团，收编了三万五千余的伪军为其爪牙。日伪以公路、河流构成密如蛛网的水陆封锁线，到处修筑碉堡，遍地设立据点，分割和压缩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和分区“清剿”。

1943年春起更增强兵力，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围以封锁篱笆，实施更加残酷、毒辣的“清乡”，妄图彻底消灭我党我军。“扫荡”与反“扫荡”，“清剿”与反“清剿”，“清乡”与反“清乡”，成为苏中敌我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伪军众多是苏中的特点，这些伪军大多是投敌的国民党军。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早期即有计划地在苏中留置数万国民党部队，同敌人默契阻止我军进入敌后抗战。这一阴谋破产后，一方面在“曲线救国”幌子下，顽军摇身变成伪军，依附日军借刀杀人；一方面以其残余继续盘踞一些地区，或直接制造摩擦，或窥测时机，与江南北上的忠救军和企图自安徽东进的反共大军里应外合，或明里暗里与日伪互相勾结互为利用，破坏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始终贯串着对顽斗争，日、伪、顽、我矛盾交织，斗争错综复杂，是苏中坚持抗日斗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的烽火燃遍了苏中的原野，群众性游击战争蓬勃展开。苏中抗日军民顽强不屈，坚持原地斗争，以武装斗争为主，运用各种斗争形式，不仅战胜了敌人的“扫荡”“清剿”“清乡”，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对苏中斗争倍加称誉，他在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由于我一师部队的英勇战斗及苏中工作同志的努力，所以虽在敌人反复‘扫荡’之下，我们仍然打下了长期坚持苏中抗战的基础”。苏中抗日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终于渡过最严重的困难，迎来了黎明。1944

年春车桥战役的胜利，是苏中对日寇局部反攻的开始，标志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新转折。苏中抗日根据地始终屹立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的北侧，不仅使日伪时时坐卧不安，而且成为对日大反攻的前进基地和尔后迎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坚强阵地。苏中人民在千锤百炼的斗争中显示出自己是英雄的人民。

粟裕在苏中的工作和斗争，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一页。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报告、总结、讲话和所写的文件、电报、文章，是他结合苏中实际，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真实记录。其中论述军事斗争的占绝大多数，政治、经济、文化等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也都有论述。我们选出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编成这本书，是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研究粟裕的军事思想，提供一部分宝贵的史料。同时也为了忠实地反映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以纪念它的创建五十周年。这对于在当前建设中发扬当年苏中人民艰苦顽强的斗争精神，征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无疑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编入本书的文稿共37篇，除《苏中抗日战争》一篇外，均为历史资料。《苏中抗日战争》选自《粟裕战争回忆录》，之所以选入并置于卷首，是为了有助于读者系统了解苏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坚持、发展的斗争全貌和增进对全书的理解。《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概况》是一师师部参谋人员整理的，上报新四军军部时粟裕已南下而未能审阅。《车桥战役详报》具体反映了车桥战役的意图和作战经过。

这两篇作为附录编入本书，也是为了便于读者对苏中根据地斗争的情况有完整的系统的了解。

这些文稿的搜集和编辑，基本上是与《粟裕军事文集》（1989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同时进行的，然而两书的内容和要求是有区别的。军事文集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以来往电报为主，着重体现粟裕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本书则集中于苏中抗日一个阶段，以报告、文章为主，在重点论述武装斗争时兼及党的领导和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有些在军事文集中节录的，本书刊用全文，只有少数篇章两书同时编入。

这些文稿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排。本着力求保持原件面貌的精神，我们对电报和已发表的文章，只作了少量的文句和史实的校订，对讲话记录作了必要的文字整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对文稿大多作了题解和注释。

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粟裕夫人楚青同志的关怀和许多老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协助，江苏省委对本书的出版鼎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我们从搜集材料、初步选编到集体定稿，断断续续历时五年有余，但至今有些资料仍未能搜集到。由于水平有限及其它原因，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

1991年12月

目 录

苏中抗日战争	(1)
黄桥战役总结 (1940年10月)	(46)
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 (1941年4月上旬)	(70)
新四军一师参谋工作会议总结 (1941年5月)	(74)
关于苏中地方武装建设的问题 (1941年6月7日)	(99)
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概况 (1941年12月)	(119)
苏中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 (1942年4月中旬)	(131)
同仇敌忾斗争是目前苏中反顽的中心 (1942年4月30日—5月 2日)	(157)
目前形势与苏中应采取方针的建议 (1942年5月10日)	(159)
做好反“清剿”的准备 (1942年5月)	(161)
结合苏中实际 贯彻精兵简政 (1942年5月至11月)	(165)
对坚持苏中斗争的几点建议 (1942年7月19日)	(173)
联系部队实际 增强党性 整顿三风 (1942年8月)	(176)
领导群众性对日伪斗争应注意的问题 (1942年10月10日)	(182)
苏中区反“清剿”斗争总结 (1942年11月)	(184)
南坎会议总结 (1942年11月)	(192)
军区教育会议报告提纲 (1942年12月16日)	(225)
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 (1942年12月)	(231)
一九四二年军事工作概况 (1942年12月)	(236)
一九四二年海上工作概况 (1942年12月)	(268)
加紧准备反“扫荡”的五项政治号召 (1943年1月25日)	(278)
论坚持苏中斗争与任务 (1943年2月)	(281)

反“清乡”斗争的策略方针和部署(1943年3月至10月)···	(289)
半年来苏中工作总结及今后四大任务(1943年6月15日)···	(296)
大江南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1943年11月4日)·····	(331)
实行党员军事化(1943年11月25日)·····	(334)
《苏中报》发刊词(1943年12月2日)·····	(340)
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概况(1943年12月)·····	(352)
我们去年在苏中做了些什么?今年还要做些什么? (1944年1月1日)·····	(384)
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1944年1月9日)·····	(394)
告“和平军”将领书(1944年1月16日)·····	(400)
整顿财经工作 肃清贪污浪费(1944年1月18日)·····	(405)
论目前苏中形势与任务(1944年2月15日)·····	(418)
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1944年3月8日、11 日)·····	(422)
附录一: 车桥战役详报(1944年3月)·····	(426)
反“扩展清乡”部署(1944年5月、6月)·····	(453)
附录二: 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概况(1944年12月)·····	(460)
附录三: 苏中抗战形势示意图(五幅)	

苏中抗日斗争

苏中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值得—写的。这里只记述1941年2月至1944年12月有关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若干问题。全面地写，题目太大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在复杂、尖锐、艰苦的斗争中，苏中得以建设成为华中基本抗日根据地之一，武装斗争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因素。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与先期过江的部队汇合，经过严重的反摩擦斗争，在同年10月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苏中抗日斗争的局面才真正打开了。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早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是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一个特点。当时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顽方韩德勤主力即将对我大举进攻，而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距黄桥地区尚远，没有条件进行战役配合。陈毅同志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时间，决心以劣势兵力，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决战。陈毅同志下这个决心，是承担重大责任的，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当时的这种紧张心情。

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以城镇为立足点，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0日，奉中央、中央军委之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我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刘炎任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11月，叶飞任一师副师长。1941年3月，组成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政委员会，刘炎、陈丕显分任苏中区党委正、副书记，管文蔚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后刘炎同志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我兼任。这是一个生死与共、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即改为第一师的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后为吉洛，即姬鹏飞）。

为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领导机关，原苏北指挥部即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部分基础。苏北指挥部是由江南指挥部改建的，经过一定的战争锻炼，精干、灵活、有效率。当时留给一师师部的，连我在内官兵共二十四人。我是1941年1月17日由盐城返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的。在我起程的前两天，陈毅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房，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人太少了把？”我立即爽快地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军长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并且说他很快就去看我们。军长的关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在此以前，我是副手，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我要单独去苏中，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很重。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

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

苏中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上海是个国际都市。苏中临近上海，可以成为我党、我军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我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民主政策的成果，能通过苏中，再由上海迅速向国内外传播，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我方在苏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蒋介石和我党我军三方必争之地，并决定了斗争的极端尖锐和复杂。这是苏中抗日斗争的又一个特点。

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苏中的战略任务是随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化的。1938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给新四军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央把江北作为江南新四军的一个发展方向，这算得是一个规划性的指示。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开辟苏北、苏中便成为关系全局的现实任务了。到1941年2月，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

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这是我们的光荣战略任务。

我认真地研究中央的这些指示，并把它们同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我理解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军事斗争策略要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有了这些思考，我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便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个认识成为我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我军进入苏北以前，日寇同国民党顽固派出于各自的利害，相互默契，相互利用。日寇占据沿江、沿大运河的重要城镇，其余广大地区由国民党统治。我们的军事实力跃居第二位以后，日顽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被打破了。我军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日寇同我军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借日寇这把刀来杀我们，另一方面为尔后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作准备。苏中抗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日军在苏中的部队原是第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分布于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伪军仅有南京“维新政府”所辖之伪绥靖军第三、第六两个师，分驻于扬州、南通。1941年春，日军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第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在苏中的防务，以加强对我进攻的力量。这个旅团的旅团长是南浦襄吉少将。旅团直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战斗力比同等的日军部队强些，有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但它所要占领的区域是整个苏中，兵力显然过于单薄，为弥补兵力不足，便对国民党军队施行诱降、压降政策，拉拢国民党武装当伪军，以达到战略上控制苏中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依附敌人，继续反共。于是国民党武装进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国民党旗帜外，大部与汪伪合流，叛国投敌。从1940年底到1941年3月，启东地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以及苏北的国民党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等，先后率部投敌，被编为伪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使苏北伪军数量迅速增加到十三个师、三个旅、四十二个正规团和十一股杂牌部队，共达三万七千余人。

日寇为了全面占领苏北、苏中，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新四军在苏北、苏中立足未稳之际，企图首先摧毁我新四军首脑机关，然后寻歼我主力部队。1941年1月11日下午，日寇以飞机十七架空袭我盐城华中总指挥部。同日上午9时，日军三千人占领我黄桥，开始了对我苏中区的“扫荡”。2月，我们获悉李长江即将率部投敌，估计日寇占领我黄桥后，将续占曲塘、海安、东台等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然后日伪配合，李长江由泰州经兴化向东北，日军由东台向北，合击盐城。

这时苏中的工作还处于开辟阶段，党政军系统在思想上、组

织上、作战方法上、工作作风上与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形势还不相适应。部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虽曾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但挺进苏北以后，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许多新参加部队的同志，更缺乏打游击的锻炼。地方工作的重心还在城镇，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农村，工作方法习惯于大刀阔斧，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部队逐渐庞杂。同时，相当多的同志盲目乐观，对今后日益艰巨的斗争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个别人面临国民党军纷纷投敌和日伪军大举进攻的紧张形势，希望离开斗争第一线，到安定的地区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区人心比较动荡。社会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为我军能否生存、能否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担忧；有些地主、商贾和游民表现动摇、观望、变态。人民群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四军打国民党顽固派很行，现在日本人来了，你打不打？能不能打胜？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顿挫日伪的进攻，抑制其嚣张气焰，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要预计到今后斗争形势将日益尖锐，转好思想弯子，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这一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在作战指导上，必需从华中全局出发，把苏中当面的反“扫荡”斗争同看好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要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求得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苏中地区，以保障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定。

苏中区的转变是同对敌作战结合进行的。我们获悉李长江准备投敌的情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的区域内，加强侦察、监视，进行讨逆准备。与此同时，我党政机关也在群众中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布置，一切公开的力量准备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2月上旬，军部来电指示：“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量解决之。”2月18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颁布讨逆令，命我为讨逆军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速率所部歼灭李逆”。陈代军长还亲临我指挥部坐镇，对部队作战斗动员。讨逆战役于当天（18日）发起，我军分三路出击，19日即连克姜埕、石家堡、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我军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2月18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我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企图进占海安、东台及兴化，并夹击我军主力。我军于讨李战役后，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我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也占领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统治的兴化等地，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者，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苏中抗战军民受到胜利的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